

# 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 ——以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赫斯的思想对话为线索

马 健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0日

### 摘 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揭示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然而, 在说明异化的第四重规定性时, 马克思遭遇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所带来的三重困境: 类哲学与对象性原理的抽象性、异化观的孤立性。此后,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吸收了赫斯的理论, 实现了从微观个体批判到宏观批判、从抽象的对象性原理到具体的对象性活动、从问题的表现到问题的原因的三重转变, 从而突破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 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 关键词

马克思, 费尔巴哈, 赫斯, 人本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 The Turn from Young Marx's Human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Taking the Intellectual Dialogue between Marx, Feuerbach and Hess as the Clue

Jian Ma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Received: April 18, 2026; accepted: May 8, 2026; published: May 20, 2026

###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s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reveals the worker's alienation from the product of labor, the activity of production, the species-being, and social relations among individuals. However, in explaining the fourth determination of alienation,

文章引用: 马健. 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J]. 哲学进展, 2026, 15(5): 190-198.

DOI: 10.12677/acpp.2026.155220

**Marx encountered three predicaments inherent in Feuerbach's humanist philosophy: the abstractness of species-philosophy and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as well as the iso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Subsequently, in the Excerpts from James Mill, Marx absorbed Hess'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achieved three shifts: from a micro-level critique of the individual to a macro-level critique; from an abstract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to concrete objective activity; and from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oblem to its underlying causes. In doing so, Marx overcame the limitations of Feuerbach's philosophy and turned towar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Keywords

**Marx, Feuerbach, Hess, Huma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青年马克思在步入社会后很快遭遇了物质利益层面的现实困境，由此开始审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性。在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一度转向人本主义，试图借助人本主义哲学来回应现实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普遍存在“孤立人”的缺陷，导致马克思在具体处理问题时陷入了一种理论上的“失语状态”。我们知道，彼时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影响，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把马克思的这种困境归结为受费尔巴哈的“孤立人”影响，因为在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稿》”)之前，他就已经在诸多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的人”的倾向。因此，导致马克思陷入这一“失语状态”的根源，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青年黑格尔派“孤立人”理论缺陷，而应当存在更深层的原因。

本文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以下简称“第一笔记本”)中异化劳动思想的文本分析，并在系统比较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思想异同的基础上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更深层原因在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在局限——即“类哲学”与“对象性原理”的抽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异化理论的孤立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的文本，并结合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思想对话，揭示马克思突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线索，进而展示其从人本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生成机制，也能进一步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

## 2. 人本主义哲学理论困境及原因的再审视

的确，写作第一笔记本的马克思确实面临着一种“孤立人”的难题，导致他陷入这种难题的原因也许比“青年黑格尔派”这个范围要更为具体。恩格斯曾直言：“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1], p. 266)恩格斯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狂飙突进”时期，给他们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费尔巴哈。所以，如果要具体地认识彼时的马克思，就要具体到费尔巴哈的理论。

### 2.1. 人与人相异化——人本主义哲学的困境

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所导致的基本事实出发，得出了异化劳动的

第一条规定。马克思观察发现，作为社会财富体现的劳动产品是工人的创造物，但是工人越从事这种劳动，他就越贫穷。这一事实表明，劳动产品作为工人的创造物，实际上成为了反对、排斥工人的异己物，即工人的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这是人与物的关系异化。

马克思接下来引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二条规定，认为既然工人与他的产品发生了异化，并且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自身不可能主动地与工人相异化。所以，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之前，一定还存在着另一种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 ([2], p. 159)所谓劳动产品，无非是工人生产活动的结晶，如果产品成为了反对工人的力量，那么这种异化的根源则在于生产产品的工人的活动本身，“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2], p. 159)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包括自然的和活动的两种性质。异化劳动的第一条规定是人作为动物的自然的属性，具体来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结果上来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如果离开自然界，一切科学发明、艺术创造都不可能产生；从过程上来说，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活动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异化劳动的第二条规定是生产活动，这是人所特有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生活或劳动是人证明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手段，也是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的一种手段。但是，若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劳动就从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手段转变为了限制人的发展的桎梏。一句话，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与自身相异化了。就这样，马克思从这两种基本的异化形式推导出了另一种异化形式——人与类本质的异化。

在第一笔记本中，异化劳动的第三条规定和第四条规定是同时出现的。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3)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2], p. 163)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是从异化的第一、二条规定中同时推导出异化的第三、四条规定的。第三条规定的推理较易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异化的第四条规定真的能由异化的前两条推导出来吗？尽管马克思在下文补充道：“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2], p. 164)但是，这依然解决不了如何从异化的前几条推导出异化的第四条规定的问题。于是，这里就产生出了一个很矛盾的点，既然无法从前三条推出第四条，那么，为什么第四条又明确地被马克思写了出来呢？有学者认为，“到异化劳动片断的结尾，马克思终于意识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缺陷，并开始尝试引入与他人的关系。”不过，与其说是马克思“意识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缺陷才引入了与他人的关系，倒不如说马克思意识到了费尔巴哈的“类”与他之前观念中的“社会”是两个东西，于是引入了与他人的“关系”作为“类”的缺陷的解决。事实上，马克思恐怕对费尔巴哈有一种误解，他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 ([3], p. 13)这句话证明，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类”理解成了“社会”。而当他在用被他理解成“社会”的“类”的概念解决问题是，他意识到了“类”并不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东西，于是他在引入了与他人的关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在《1844手稿》中得到解决。

并且，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生产活动不属于自己，进而整个的类本质、他人也和自己分离，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这却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问题。就是说，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仅仅是对现象的理论化阐释，它不是对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揭示和分析。马克思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他想要真正去做的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可是如果仅仅局限在对现象本身的分析而不深入到导致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是无法被真正认识的，更不要提问题的解决了。所以，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劳动异化这一“现象”背后的那个更为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 2.2. 抽象、思辨、孤立的人本主义窠臼

如上所说，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分析的核心是四种异化关系，在这四种异化关系中，占核心地位的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这明显是费尔巴哈哲学话语体系里的东西。由于这种东西的存在，正在写作第一笔记本的马克思无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着明显的抽象性、思辨性和由此导致的孤立性。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揭示了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在费尔巴哈看来是意识。费尔巴哈认为，把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的意识不是自我感或感性的识别力，也不是能够根据一定的显著标志而作出的对外界事物的知觉甚或判断的能力，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4], p. 4)。当人把自己的本质当作自己的对象，人也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就在于“理性、意志、心”。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具有一定抽象性和思辨性。

在“类”的问题上，费尔巴哈所说的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有机体，相反，它是一个生硬的哲学抽象。费尔巴哈首先取消了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差异性，以抽象的、总体的“人”统括了每一个人。然后，他把这个“人”的集合体称之为类，并声称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他确实找到了个人和个人的联系，但这是以消灭个人的特殊性为代价的。费尔巴哈的这种方法只是在自己的思维中把“个人”和“个人”强行捏合在了一起，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的联系，所以他根本无法揭示“类”何以真正地成为“类”。

在“对象”的问题上，费尔巴哈认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4], p. 6)这确实体现了费尔巴哈对对象的高度看重，但是这种对对象的考察事实上也是抽象的、思辨的。的确，人是对象性存在的，一个人具有何种特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如果没有对象是根本不能被认识的。但问题是，费尔巴哈仅仅停留在了揭示“人是对象性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揭示人的对象性是怎么运作的。换句话说，费尔巴哈没有给出某物成为某人的对象的中间过程，而只是力图在思维和想象中来实现某物和某人的对象性关系。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理论是有明显的缺陷的，这种人本主义是他的理论基点，这直接导致了费尔巴哈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恩格斯对此评价道：“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1], p. 287)

类哲学与对象性原理的抽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异化观的孤立性，是费尔巴哈哲学存在的缺陷。在这套理论体系里，人看似是社会的，但实际上仍然是孤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正确的，“类”与“社会本质上是两个东西”。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的一、二条规定实际上是从劳动的两个方面展开的，即劳动对象和劳动活动本身，这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所以异化劳动的第三条规定实际上就是对前两条规定的总结。可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异化观错误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马克思劳动异化的前三条规定表现出了抽象的、孤立的特征。物的异化、活动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似乎只是在某个人身上发生的，只要他是一个劳动者，他的劳动就发生了异化。马克思在该节开篇就指出，他要探究的是私有财产的起源，可是，私有财产并不能从孤立的人身上产生。马克思对人是类存在物的规定在前三条的论述中类消失了，“类”在第三条规定中仅仅是作为抽象的范畴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具体的人的社会规定性而存在的。要想科学解释私有财产的起源，就必须揭示出类的具体性，即找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

在对第四条的详细说明中，马克思指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2], pp. 163-164）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是借助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来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费尔巴哈的这种对象性原理是抽象思辨的。所以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对象性原理只能帮他分析现象是怎么样的，而不能进一步阐述导致现象背后的那个更为本质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为何会让人成为“非人”？

### 3. 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路径

受制于费尔巴哈哲学观念的束缚，马克思无法超越类哲学与对象性原理的抽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异化观的孤立性。这种人本主义缺陷的克服很大程度上与赫斯有关。正是通过与赫斯的思想交流，马克思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费尔巴哈的“孤立人”。这一突破，具体地体现在几乎与《1844手稿》同时期写作的《穆勒评注》中。

#### 3.1. 《货币的本质》——新的理论支点

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就与赫斯交往甚密。“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他读到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5], p. 50）在思想上，赫斯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影响。本文在上一部分的末尾提到，马克思此时无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是在赫斯的交往理论中却包含着这一问题的答案。

第一，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但是赫斯不同，在赫斯看来，“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Lebensthätigkeit)的交换。”（[6], p. 137）所以，对生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换的中介，人总是处在社会中，所以“人彼此交换其社会的生活活动的领域——即社会中的交往(Verkehr)——是不可让渡的社会的生活要素。”（[6], p. 138）所以，人的现实在于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在于人同整个社会的联系。于是赫斯得出结论：“个体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互相激发，这种共同活动，是个人的现实的本质(wirkliches Wesen)，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wirkliches Vermögen)。”（[6], p. 138）

交往是人的本质——这是赫斯提供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理论支点。

第二，在揭示交往是人的本质的基础上，赫斯又揭示了交往的历史性。起初的交往是个别化的交往，在这种个别化的交往中“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交换，只能够出现以产品牟取暴利的买卖(Verschacherung)”（[6], p. 143）。赫斯认为，这种形式的交往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世界观”，而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在这样的世界观下，“个体就是生活的目的，而类生活却是生活的手段”（[6], p. 144）。而这样的“类生活就是货币”（[6], p. 145）。所以，货币是一种颠倒了的社会——在真正的社会中，人不光在类中而且是为了类而生活的；在颠倒的社会中，人是把自己外化为类并且不得不用类来衡量自己的。

这是赫斯为马克思提供的第二个理论支点——货币逻辑是一种异化的交往形式。

由此可见，赫斯从交往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关系的货币化，从而解释了普遍的剥削和普遍的“奴隶制”的产生。这样的理论刚好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解答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的那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 3.2. 人本主义困境的破局路径

赫斯从交往是人的本质出发，揭示了货币逻辑是一种异化的交往形式。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的“交换”一节中则从相反的方向出发，得出了交往是人的本质的结论，进而超越了过去的自己。当马克思读到穆勒关于货币的理论时，马克思说：“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

表达了事情的本质。” ([7], p. 18)在这里可以看出, 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赫斯的思想, 他从这里出发, 开始了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 马克思揭示了货币的本质: “货币的本质, 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 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 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 成为货币的属性。” ([7], p. 18)在马克思看来, 货币的本质不是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中介, 这种中介只是货币的浅层次的表现形式。货币实际本质在于, 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形式,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异化。这就是说, 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货币成为了支配人的异己性力量。为了进一步说明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对银行业和信用业进行了分析。银行业和信用业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媒介的货币的物质属性的丧失, 但这绝不意味着作为人与人的关系退回到了非异化的原生状态。信贷就其本质而言, 绝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相反, 它使这种异化更加深入。马克思指出: “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 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 ([7], pp. 21-22)这一迹象表明了: “货币越是抽象, 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 它越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 ([7], p. 21)这实际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 货币这一媒介越是独立, 它就越能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越能证明自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产物; 第二, 货币越是独立, 它就越能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产物而存在。

这样, 马克思通过对货币、信用业和银行业的研究揭示了人们交换活动的货币属性, 并揭示了这种货币属性的异化本质。

其次,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考察, 揭示了这种交往异化的诞生, 进而揭示了交往是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 ([7], p. 25)。在他看来, 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出发点, 这是“同现实的运动一样”的。他汲取了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从私有财产的角度出发考察交往异化的起源, 认为私有财产之所以进行社会运动, 是由于一个私有者的私有物与另一个私有者的需要相契合, “另一个人也是私有者, 然而不是另一种物的私有者, 这种物是我需要的, 我没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愿意没有它, 在我看来, 它是补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 ([7], p. 26)正是由于对对方的产品的需要, 人才会主动地去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需要是产品的需要, 这种建立起来的关系不是真正的关系, 而是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的物与物的关系。

赫斯同费尔巴哈一样, 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异化的关系, 他把这种非异化的状态表述为一种为彼此、为类而活动的状态。此时马克思受他们两个影响, 认为交往也存在着一种非异化的状态。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 马克思抹去了交往的异化状态, 揭示了一种真正的交往的状态: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 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 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7], p. 24)

### 3.3. 交往异化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超越

比较来看, 在第一笔记本的第四条的相关论述中, 马克思仅仅将对象性原理停留在思维和逻辑中。但在《穆勒评注》中, 马克思则找到了这种抽象的对象性原理的现实承载体——社会交往。人们通过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社会体。在赫斯的理论援助下,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实现了从“自主自觉的劳动”到“交往”的转变, 随着这种转变的完成, 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无法解决的那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对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的发掘也意味着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框架的窠臼——类哲学与对象性原理的抽象性、异化观的孤立性的突破。

首先, 马克思克服了对对象性原理的抽象性。马克思把对象性原理从纯粹的思辨领域落实到了现实的

经济活动当中去。具体来说，在写作《穆勒评注》的马克思看来，人与人的关系是私有者与私有者的关系，而私有者和私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对方的物的需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换言之，私有者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赖以存在的根本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现实的经济交往活动。就这样，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抽象思辨的对象性关系发展成为了作为现实对象性交往的社会经济交往。

其次，马克思克服了“类”的抽象性。我们在前文提到，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所使用的“类”是把“个人”和“个人”强行在思维中捏合在一起的人的抽象，所以它具有抽象性。既然现在马克思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现实的经济交往中建立起来的，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也显而易见了。至此，有两种“类”出现在我们面前，第一种是费尔巴哈哲学话语体系下的抽象的“类”，第二种是马克思在赫斯的理论支援下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发现的人的“社会”。曾经，马克思使用“类本质”，但是现在他发现，所谓“类本质”的本质并不在于如“自主自觉的劳动”等其他的东西，“类本质”所指向的那个本质就在于“类”，而这个“类”就是社会。所以，马克思说“……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7], p. 37)这句话是一句反复的强调，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等于“社会”，这是社会之“类”对抽象之“类”的超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501)这句话通常被作为马克思将人视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依据。同样，我们可以看出《穆勒评注》中马克思的话已经十分接近《提纲》中的表述了，这也间接证明《穆勒评注》中的马克思对于“类”的抽象性的克服已经相当成熟了。

最后，当马克思推动费尔巴哈的抽象社会性的具体化之后，异化的孤立性也就消失了。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揭示了异化不是简单地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现象，而是涉及到整个共同体的普遍现象。这样一来，支配人的便不再是人、物或者他的类本质等异化的微观层面表现。马克思在这里将异化的微观视角发展成异化的宏观视角，揭示了整个社会的异化。

#### 4. 交往异化对异化劳动的超越包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

从1844年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马克思思想发展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实现了巨大飞跃。通过上文，我们可知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推动了异化理论的具体化与社会化，这在事实上包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

##### 4.1. 从微观个体批判上升到宏观批判：开启社会基本矛盾视角

在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揭示了工人的异化的四个表现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人生活的困苦局面。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这种分析是微观的，只是用个体处境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之处，甚至在道义上批判资本主义。但这种批判形式并不能真正地揭示压迫和剥削的来源，也不能真正地揭示出革命对象。换句话说，既然工人的苦难是由异化劳动造成的，那么异化劳动问题只能通过消灭异化劳动来解决。但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在其中运用的批判方法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加强了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根源的论述。与第一笔记本不同，《穆勒评注》的分析是宏观的，这种宏观的分析方法开辟了从社会基本矛盾层面论述异化劳动根源的视角。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揭示了人们进行活动的真正的出发点是需要。正是由于需要，人们之间才会发生交往活动，并无法脱离这种交往活动。这就解决了第一笔记本所解决不了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揭示了，劳动之所以发生异化，是因为这种劳动被置于了异化的交往活动中，进而成为了纯粹的谋生劳动。所以，异化劳动的解决或工人的解放在这里已经十分明晰了：人们无法对自己的现实需要进行革命，人们只能改变其所能改变的交往关系。因此，要改变人们自我异化的处境，就要改变这种人与人

之间异化了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相较于第一笔记本批判路径的巨大进步，马克思所批判的已不再是个人处于其中的生活境遇，而是更为宏观、更为彻底的异化了的交往关系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这样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 ([8], p. 591)马克思在此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巴黎手稿时期取得的初步研究的进一步总结。

#### 4.2. 从抽象的对象性原理到具体的对象性活动：奠定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

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是一种抽象对象性原理。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只能通过对象来感受自身。但这在保留人的认识能力的同时，却没有重视到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一种受动的人，这种人只能不断地接受存在的客体给予他的直观现存，而无法主动地改造或创造出新的客体。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2], p. 499)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思维而诉诸直观的直接结果就是消解了人的革命性。

由于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抽象对象性原理，人的地位在第一笔记本中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了。面临异化了的物、异化了的的活动、异化了的类本质以及异化了的他人，马克思指出了具体解放路径：“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2], p. 167)。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证思路是：工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要把人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就要先实现工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唯一能掌控的对象性活动只是他的劳动，但异化劳动不仅不能使他解放，却不断地使其异化。并且，由于人与之间的关系只是私有财产关系的外化，人的解放被私有财产关系所限制。

这些问题在《穆勒评注》中的解决与马克思的立足点有关。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开展论述的立足点是异化的个人，而《穆勒评注》中他的立足点则转变为了异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异化关系是由人的现实的活动构建起来的，如果人们想要改变这种异化的关系，就必须改变人的活动。尽管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没有提及实践，可对象性原理一旦被具体的人的活动执行，抽象直观也就被人的活动所消灭。随着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确立，人的主体性也随之确立，“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重要意义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 5. 结语

尽管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已无限接近其新世界观的形成，但《巴黎手稿》毕竟处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夜，其理论表达与成熟形态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在本文第二部分“人本主义的破局路径”结尾，我们指出：马克思通过抹除交往的异化形态，揭示出一种“真正的”交往状态。这实际上体现了早期马克思思想中仍存的人本主义哲学残余。因为他在理论中预设了一种理想化的交往状态，并将现实运动理解为向此理想状态的复归，这一预设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直到后来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揭示现实社会的客观历史规律后，马克思才真正克服了这种唯心主义。

当然，对唯心主义的克服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的超越具有“扬弃”的意义。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依然将“人”置于其思想的核心地位：他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的人本主义。可见，“人”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始终。正是对人的执着追求，引领他走向人本主义；也正是对人的执着追求，使他超越人本主义，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因此，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并非偶然，而是其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物的力量吞噬人的力量”这一历史境况的必然要求。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5] 安启念. 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6] 赫斯. 赫斯精粹[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34-167.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